



2016 年北京市文物局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
北京市文物局科研丛书

南柯庭集

赵 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16 年北京市文物局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
北京市文物局科研丛书

南 柯 庭 集

赵 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北京市文物局
图书资料中心

古楸轩书丛

总第壹部

乙种第壹部

《南柯庭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柯庭集 / 赵迅著 .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18.5

ISBN 978 - 7 - 5402 - 4262 - 6

I . ①南 … II . ①赵 … III . ①古建筑 — 北京
— 文集 IV . ① TU - 09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1501 号

《南柯庭集》

封面题字：谢辰生

责任编辑：刘朝霞 程丹 战文婧

特约编辑：罗梦娇

封面设计：耿中虎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100054

电话传真：86 - 10 - 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 mm × 230 mm 1/16

字 数：440 千字

印 张：29

版 次：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02 - 4262 - 6

定 价：78.00 元

目 录

“北京人”化石失踪的前前后后	1
周口店的沧桑	9
魏太和造像	14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	16
古刹悯忠话沧桑	26
天宁寺塔	39
北海杂忆	44
纪念北海公园建园840周年座谈会讲话提纲	48
北海白塔	49
北海公园的大圆镜智宝殿	53
东岳庙概述	55
天 坛	203
祭坛遗址和北京地区的圜丘	217
太 庙	230
法海寺	234
隆福寺	236
京师九门	239
正阳门箭楼	241
真觉寺金刚宝座（五塔寺塔）	244
承恩寺	247

大慧寺	249
广仁宫（西顶）	252
万里长城北京段	255
历代帝王庙	260
妙应寺白塔的建筑结构与修缮	263
妙应寺白塔上的小铜碑	271
长椿寺铜塔的铸造年代	273
宛平城里的“武俊刻石”	275
郑王府	277
礼王府	279
克勤郡王府	282
顺承郡王府	284
恭王府及花园	286
醇亲王府	315
醇亲王南府	318
醇亲王园寝	320
孚王府	323
西林春和奕绘贝勒的五世孙——金启棕	326
东堂	328
锦什坊街清真寺	330
福佑寺	332
康熙皇帝和纳兰成德	333
从《重修榆河乡东岳行宫碑记》谈起	339
觉生寺（大钟寺）	345
兆惠宅第旧址	348
汇通祠	349
宝相寺旭华之阁	352
清净化城塔	354
纪晓岚故居	359

公主坟内埋葬的不是孔四贞	361
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	363
清农事试验场旧址	366
那家花园	369
崇礼住宅	371
门神库	375
关于北京香山正白旗卅八号发现的题壁诗	377
辛亥滦州起义纪念园	386
基督教青年会旧址	394
庆王府	396
“纪念园”话沧桑	399
王府井谈往	403
四牌楼的拆除	405
北京的四合院	407
百年回首	
——为迎接香港回归旧作	410
李大钊烈士陵园	413
杨昌济旧居	416
北京美国学校旧址	418
和平解放北平的一处和谈旧址	419
关于开展从废旧回收物资中拣选文物工作情况	421
奥地利文物保护工作概述	427
德国的文物保护参观记	432
应用丙烯酸树脂全浸渍法保护石质文物的经验	435
氧化物层在金属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华沙西格门王三世瓦兹的纪念圆柱的保护工作	441
奥地利掠影	445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449
后记	452

“北京人”化石失踪的前前后后

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北京人”(*Peking Man*)的头盖骨，自从1929年12月2日被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1904—1982)博士首先在房山周口店发现之后，过了10余年，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便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到处寻找，皆以失望而告终，如今找到的希望已极为渺茫。“北京人”的失踪，成了古人类学历史上的无头公案。遗憾的是，直到1982年9月18日，79岁的裴文中先生撒手尘寰的一刻，再也未能亲自看上一眼他的心血结晶，这是日本发动战争所导致的悲剧。

古猿在向人类进化过程中，在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第一件工具——打制石器出现的同时，他们才有资格迈进了人类的门槛，得到了“人”的称号。因而经过裴文中、贾兰坡(1908—2001，原中国科学院院士、声誉卓著的古人类学家)以及众多的中外学者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备受全世界古人类学者珍视的原因。

抗战前的周口店发掘研究工作，是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财政上的支持而进行的，由该基金会提供了协和医学院的娄公楼(Lockhart Hall)和B楼的解剖系作为研究工作和标本存放处所(城内另外的工作地点还有西四兵马司和丰盛胡同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后楼)。由于基金会代表者不准许日本学者参与周口店“北京人”的研究和发掘，只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参加，日本人对这项重要事业当然不甘心被排除在外。

八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人插手周口店的工作只是时间问题了。抗战初期，日美之间还没有交战，野外发掘虽不能进行，室内研究工作还能继续维持。1937年10月间，日本人在北京组织伪政权，地质调查所已无法维持。由于协和医学院当时还比较安全和保险，遂将地质所的房产、设备、家具、标本等都移交协和代管以求保存，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也就成了协和医学院的一个附属组织了。除了一直存放在协和的“北京人”标本之外，其余重要标本也都运到协和存放。到了1941年，日本准备进攻南太平洋，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当时曾有过把“北京人”标本运至美国的打算，但因当初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订有合同，规定所有标本均属中国财产，不许运往外国，由于此时情况有变，遂电请重庆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长翁文灏（1889—1971，著名地质地理学家），请求批准将“北京人”标本运出国境，直到11月间才由北京的美国使馆转来翁文灏的批文，允许将“北京人”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于是将化石标本装入两个大木箱中，再锁进保险柜。代表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德籍犹太学者魏敦瑞教授（Prof.Franz Weidenreich）已改入美国国籍，于4月间定居纽约，在自然博物馆继续他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保险柜的钥匙由魏的秘书赫斯伯格女士（Miss Hirschberg）掌管。此时已是12月初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Pearl Harbor），中了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总统的苦肉之计，在虚幻的胜利声中，把美国设在北京的一切机构统统占领。8日清晨，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日本人派了两名荷枪士兵把守住解剖系装有“北京人”标本的保险柜，并命赫斯伯格打开保险柜后，发现标本已经变成了石膏模型，又命女秘书将保险柜锁好，仍由两名日本兵看守。

此前，在12月初的一个下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1882—1969）和地质学助教高井冬二曾来北京，高井提出要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目的是研究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等到发现“北京人”标本是假的以后，高井也就不来了，说明他的图谋很明确，就是为了“北京人”化石标本而来的。这以后，占领协和的一名日军大尉曾问过裴文中“北京人”

化石的下落，裴先生答他的办公室离解剖系远，不知化石的下落。次年（1942年）8月间（一说四五月间），高井又来北京，追问过裴先生“北京人”标本的下落，裴仍答不知道，高井也没再追问。这期间，北京的日文报刊和日本的两家大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北京人”失踪的消息，消息大意为：“北京人”的重要标本原存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但日军接收时，保险柜内却全换成了石膏做的模型，据悉，这些标本是中国的财产，不许运往外国，但美国人不顾信义，将这些标本偷运到美国去了。

这次，长谷部和高井在北京活动了一个多月，没有得到“北京人”的信息，据说他们回到东京后，即上书文部省报告此事，文部省转呈天皇裕仁，并请求命令华北驻屯军负责搜查“北京人”的标本。1943年4月，华北驻屯军派了一个专门担任搜寻化石任务的特工人员锭者繁晴。此人能讲流利的英语，还有个英文名字叫乔治亚（Georgia），他接受任务后，在三天之内问遍了所有的有关人员，连当时被拘押的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都问到了。锭者对裴文中的问话，主要是问清楚什么人装的箱，什么人管保险柜，标本曾放在什么地方以及最后看到标本是什么时候。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方人员再也没有提及找寻“北京人”标本的事。当时距标本丢失的时间并不长，这桩惊动天皇的案子，精明强干而又无孔不入的锭者，如果毫无收获，他敢不敢轻易地善罢甘休呢？

真的“北京人”化石，据说12月初装箱后，连同协和医学院的其他重要物件，一起送往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又转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便由北京撤退时由陆战队负责运往纽约。这以后，有关“北京人”化石的命运有如下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在从北京开赴秦皇岛的美军运送珍贵物品专列上找到了“北京人”化石，他们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物品装上驳船，准备送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但是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沉到了海底；另一种说法认为专列在中途被日本兵劫持了，劫车的日本人不懂这些化石的价值，就当成破烂扔掉，或者已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药材商人；果真如此，则早就被研成粉末入药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已被运到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还未装船，就发生了日军占领事件，化石从此不明下落。

姑且不论哪种说法更可靠，事实是从这时起，“北京人”化石全部失踪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年11月19日，美联社以《拯救“北京人”遗骸——包括在掠夺品之内的地质学珍品在日本发现》为题自东京发布了消息；次年1月2日，英文《北京新闻》援引路透社1月1日上海电讯报道说“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消息。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从美军总部接收的东西中，并没有“北京人”化石，归还的“标本”仍然是石膏模型。据此，裴文中先生曾委托代表团顾问李济博士在日本代访“北京人”的下落。李济在东京寻找“北京人”前后达五次，结果一无所获，甚至连东京帝国大学的知情人——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都踪影皆无。

“北京人”的失踪成了震撼世界的一桩大案，它的命运一直被各种各样的荒诞不经的传说和谣言所笼罩。有的人拿出时间、付出金钱到处寻找，尽管信息不少，但虚无缥缈、矛盾百出者众，而确切者还没有发现过。后来甚至发生了以找寻“北京人”为名，在美国骗钱的无耻之徒——克里斯托弗·贾纳斯（Christopher Janus）。

《纽约时报》新闻社于1971年10月21日电讯中公布了有关“北京人”的一项信息，消息说：“这一新的希望是由纽约的一位内科医生威廉·弗利最近的透露引起的。他1941年在中国曾占有这些化石，后来他在被入侵的日本人逮捕入狱之前，把这些化石藏在中国朋友家里和一家货栈里。弗利已同意提供他委托保存这些骨骼的那些人的姓名和地址。”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哈里·夏皮罗宣布了这件事。夏皮罗说，弗利只是在今年（1971年）春天才把这种情况讲出来。夏皮罗写的关于这些化石的丢失及其新线索的文章，将刊登在11月一期的《自然历史》杂志上。”

夏皮罗（Harry L. Shapiro）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是一位热心的“北京人”搜寻者，他的专著《北京人》于1975年在纽约出版，次年由黄骥译成中文在台湾木鸡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占用了百分之二十的篇幅，以《迟到的新闻》为题，专门讨论了“北京人”化石丢失的问题，并一再谈到威廉·弗利。

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1912—1992）是著名的心脏病学专家。珍

珠港事件前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任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任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医官。1941年11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中国时，护送化石的任务就是交给弗利执行的。但是他还未来得及带走化石，珍珠港事件突然爆发，弗利很快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并于日本投降前夕被送往日本北海道直至被遣返回美国，战后在美国行医。日本人后来一再声称他们并未找到“北京人”化石，因此，弗利就成了最后接触到这批化石、掌握它们下落的关键人物。多年来，许多人为了追寻“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设法套取弗利的“口供”，但他始终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守口如瓶。

日本读卖新闻社借“北京人”化石模型1980年在日本展览之机，特派特派记者去纽约访问了弗利，就“北京人”的下落向他提问时，弗利回答说：“（当年）美日两国举行华盛顿会议商讨并寻求解除危机、防止战争的途径，但会谈结束了却毫无积极的结果。美国感到战争危险更加大了，因此，美国采取应急措施，决定撤退驻华美军，‘北京人’化石作为撤退计划的一部分，随同美海军陆战队贵重物资一起运出中国。”

“……当时决定，12月9日，‘北京人’化石装在我的提包里，由我携带离开北京，先到秦皇岛美军兵营，然后从那里搭乘哈里森总统号客轮（S.S.the President Harrison）经马尼拉附近的一个美军基地运到美国。转移计划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我和艾休斯特上校（Colonel Ashurst）两人知道，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没有第三者知道。”

弗利虽然知道线索，但他并未带走“北京人”化石。因此，夏皮罗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倒希望到中国会同那儿的同行，到巴士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或瑞士仓库旧址去看看，也许在某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还可以找到弗利医师放在那儿的军用提箱。

夏皮罗说到做到，1980年9月，带着他的女儿访问了中国。他在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的合作下，来到天津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化石。

据夏皮罗说，他的美国朋友曾告诉他说，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放在曾经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的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层下面。他还携带了1939年拍摄的兵营建造物的复印照片。虽然得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黑延昌等人的协助，很快就找到了解放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的旧址，但是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6号楼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原址已被改为操场，而且时隔多年，该楼经过好几个单位占用过，装“北京人”的箱子早已不知去向。这位真心想找“北京人”化石的学者不远万里乘兴而来，结果一无所获，败兴而返。

有关“北京人”的著述，除夏皮罗的《北京人》之外，曾做过魏敦瑞秘书的赫斯伯格于1977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北京人失踪》，1979年又由日本人松木清张译成日文出版。赫斯伯格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时间并不长，对当时的许多事情不是很知情的。尤其是她的书是用小说体裁书写，难免掺进艺术夸张，因之只能当作文学作品来鉴赏。

1951年5月，裴文中先生撰写了《龙骨山的变迁》手稿，后经整理发表于1983年第2期《中国科技史料》上，其中有《北京人的失踪》一节，披露了有关“北京人”失踪的某些细节。

1984年4月，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贾兰坡、黄慰文合著《周口店发掘记》一书中，也用了不少篇幅对“北京人”的失踪案做了较详尽的介绍。

和哈里·夏皮罗《北京人》出版同时，前面提到过的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和别人合写的《搜寻北京人》，于1975年在美国出版，同年由巴顿译成中文出版，改名《北京人之谜》。

在评价此书之前，请先看一篇由《华声报》转载的报道：1993年3月8日，《纽约邮报》刊登一则消息：“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悬赏2500美元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布朗认为，遗失了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在纽约大都会地区。他说，早在1970年的某一天，一位美国妇女给当时正潜心寻找‘北京人’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打来电话，约定在帝国大厦见面。见面后，那位妇女告诉克里斯托弗，她丈夫生前曾保存了‘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她还把有关照片交给了他。哈佛大学教授厄尔斯证实了这些照片正是‘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可惜后来克里斯托弗与那位妇女失去了联系，直到1991年，布朗突然收到1941年前后居住在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北京人’的遗失而身系囹圄的弗利博士的信，信中说关于‘北京人’的下落，现在有了新的进展，他已经与那位声称珍藏着‘北京人’化石的妇女取得联系，并希望尽快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谜。不幸的是，去

年秋天弗利博士却去世了，‘北京人’从此又石沉大海。

“布朗在谈到悬赏巨款寻找‘北京人’化石时表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是中国古代遗产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从这一遗失的化石中，我们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北京人’的生活情况。我出钱去寻找一件无价之宝，那是十分有价值的。”

这则消息失实处实在太多。

说克里斯托弗是科学家就不实，他和科学不沾边，其职业是芝加哥股票经纪人和商人。他和那位无名无姓40多岁颇有姿色的中年妇女的故事，在夏皮罗的《北京人》上介绍颇详，书上还刊出了那位妇女提供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堆碎骨，里面有指骨和盆骨等从未发现过的“北京人”骨骼，一看便知不是“北京人”的化石。而报道中说哈佛大学厄尔斯教授竟能证实这些照片正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真够大胆的。更为奇怪的是，弗利博士（弗利是医师而不是博士。医师和博士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这里显然是被翻译者弄错了）竟然能和一位无名无姓的妇女神話般地取得了联系，因而“有了新的进展”。眼看奇迹就要出现，没料想1992年秋天，弗利博士驾鹤西归，仅有的一线曙光又被乌云遮掩了。

克里斯托弗不但和科学不沾边，对于写作怕也不在行，所以找来一位写过电影脚本的作家布拉谢勒（William Brashler）为其捉刀，写成《搜寻北京人》，由二人署名。而布拉谢勒和“北京人”也属素昧平生，因而此书内容也就不言而喻了。

克里斯托弗·贾纳斯1972年5月访华时，曾亲往周口店考察。他当时曾向我们的接待人员表示愿为寻找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出力，回国后即向美国报界宣称愿出5000美元，悬赏寻找“北京人”化石。

数年之后，《纽约时报》于1981年2月26日（星期四）以《金融家为寻找“北京人”遗骨被控有欺诈行为》为题，报道了下述消息：

“路透社芝加哥2月25日电：芝加哥金融家克里斯托弗·贾纳斯为寻找遗失的‘北京人’遗骨，今日被联邦检察官起诉，有欺诈64万美元之嫌。

“联邦大陪审员指出，贾纳斯先生现年69岁，根据法律第37条款，起诉他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活动而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被他据为已有。

“起诉书说，退休的银行家贾纳斯先生从银行借款中得到52万美元，另外从投资者手中得到为了寻找和摄制‘北京人’的影片又获得12万美元……”

白纸黑字，使克里斯托弗又有了一重“骗子”的身份，原来他是为了诈骗几十万美元而装扮成一位热心寻找“北京人”的“科学家”，而布朗先生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还为这个骗子吹嘘他的功绩。作为一名愿出赏金寻找“北京人”的“历史学家”，连这么点当代新闻都一无所知，应该说是不够格的。

半个世纪转眼而过，噩梦般的“二战”早成过眼烟云，弗利医师带着他的隐私去见上帝，其他知情人如艾休斯特上校、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锭者繁晴诸人又都不明去向。太平洋一战，使得珍珠港美舰化为一堆废铁，“北京人”遭受了池鱼之殃，至今成了水中明月、镜里鲜花。

报载：2005年6月9日上午召开的第三届“北京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奥运文化广场房山主会场系列活动暨第十一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近日将由政府牵头发起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活动。在7月2日的房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上，将筹备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组织机构。这是首次由政府组织进行“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

人们没有忘记“北京人”和他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贾兰坡院士和为“北京人”出过力的中外友人。

周口店的沧桑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乡。该遗址包括北京猿人（直立人阶段）、新洞人（古人阶段）、山顶洞人（新人阶段）三种人类化石和他们留下的石器、用火遗迹、居住洞穴，还包括从一千多万年前起到几万年前的古脊椎动物地点、旧石器文化地点等共26处。遗址和遗存物有力地证明这里是我们的远祖从70万年前起一直到1万年前生息繁衍、劳动斗争留下了他们的居住洞穴、用火、狩猎、采集、制作石器和装饰品以及埋葬遗骸的地方。这样的遗址是迄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向受到国内外的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考古学、新生代地质学等方面的学者专家的高度重视。周口店遗址于1961年3月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遗址从1921年发现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在我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奠定了它划时代的意义。我国的知名学者、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贾兰坡等献出了毕生心血从事发掘和研究工作，他们的后继者、成批的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人员，忘我地继续他们的事业。自1927—1937年的10年间，所用经费即达30万美元之多。新中国成立后，遗址的继续发掘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发掘和研究成果都较前更加扩大和提高。1979年12月，隆重举行“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纪念会”，1984年12月又举行“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发现55周年学术纪念茶话会”，1989年又举行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60周年纪念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口店遗址遭到破坏和损失，由于遗址内兴建、扩建了一些小石灰厂和小水泥厂，使得遗址中经过发掘编号的26个地点，除去7个地点因在遗址展览区围墙内幸存下来外，其余都因开山采石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北京猿人最早生活和用火的第13地点已毁坏，时代最早（距今14万多年）的曾挖掘出过近2000条鱼化石的第14地点半壁已被破坏。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周口店公社石灰厂逐渐扩大生产规模，1976年又把因污染严重而停产的永定门水泥厂的全套设备迁到周口店继续生产。1983年初，前公社水泥厂在靠展览馆和猿人洞约300米处扩建了年产5万吨的水泥生产车间，三个采石场将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完全破坏，对遗址造成更大的威胁和损害。198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猿人遗址旁不应建水泥厂》的文章，其他报刊也报道了告急呼吁。房山县（今房山区）为舆论压力所迫，于21日对周口店水泥厂扩建工程下了停工令，但实际上破坏仍在进行，且愈演愈烈。这种破坏造成了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更给我们国家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我国知名的科学家周明镇（1918—1996，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吴汝康（1916—2006，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解剖学会理事长）、贾兰坡（1908—2001，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委员会委员）于1983年6月联名上书党中央。标题为“恳切希望党中央关心北京猿人遗址保护问题”，结尾处有如下一段话：“我们认为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四条指示方针英明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都已公布，如果在首都国门之下还不能阻止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被破坏和受污染，无论在全国、在世界上，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事关重大，特具名向党中央报告，希望中央批示，由北京市统一规划，妥善安排。”中央对此事极为关注，赵紫阳、万里、方毅等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并批转北京市办理。市委、市政府也极为重视，市委、市政府领导人要求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解决。1983年6月22日下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周口店猿人遗址的保护问题。会议由白介夫副市长主持。市人大、市政协的同志，市计委、市经委、市农办、市建材局、市环保局、市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房山县（今房山区）政府和周口店公社（今周口店镇）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一）市政府根据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关于北京猿人遗址的保护范围，确定了遗址保护范围的界限。保护范围是东界铁路，西界龙骨山西山根，南界公路，北界老牛沟。（二）在遗址范围内不许搞破坏性和污染性的生产。遗址范围内现有的有破坏性的、污染性的生产单位，要限期搬迁、转产。要求有关方面在一周之内提出搬迁方案。（三）关于搬迁资金来源，由有关各方筹集解决。（四）要求文物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定出保护北京猿人遗址的具体条例。（五）市政府要求房山县政府组成专门班子，研究搬迁问题。1984年6月又召开过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制止污染破坏遗址的问题。经过多方努力，由中国科学院、市政府、房山区、周口店乡等共筹集了1400万元，用于解决保护区内工厂企业的搬迁。1984年11月21日，市政府批转市规划局、市文物局《关于第一批划定60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报告》中，具体规定出周口店遗址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

1983年10月间，房山县才表示将要迁走污染文物的工厂以保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11月间周口店乡还组织干部参观学习，上文物保护课以示重视周口店遗址的保护。一直到1986年初，周口店乡水泥厂才宣布停产搬迁。但是其厂房、办公楼、灰窑并未能彻底拆除，1987年3月以后，城关镇复合肥料厂、石楼乡石子加工厂和原周口店乡水泥厂，又利用旧厂房陆续开工生产，点燃了四个旧石灰窑筒和两个土灶。北京猿人遗址仍然持续着烟尘滚滚、炮声隆隆的局面，而且较以前更加严重。1987年7月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了遗址污染情况之严重。房山区信访办公室答复说：“现在我区环保部门正在与有关单位制定‘保护规划’，具体工作正在进行。”1988年上半年，城关镇复合肥料厂未经批准，建起了856平方米的简易库房；同年夏，石楼乡石子加工厂在遗址保护范围内建了新厂，区工商局未经区文物部门同意，竟然发给了该乡营业执照，乡政府投资数万元在遗址保护范围内放炮崩山，生产石子。遗址再次遭到变本加厉的污染破坏。

1988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署名文章揭露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标题是《已搬迁的企业“死灰复燃”——北京猿